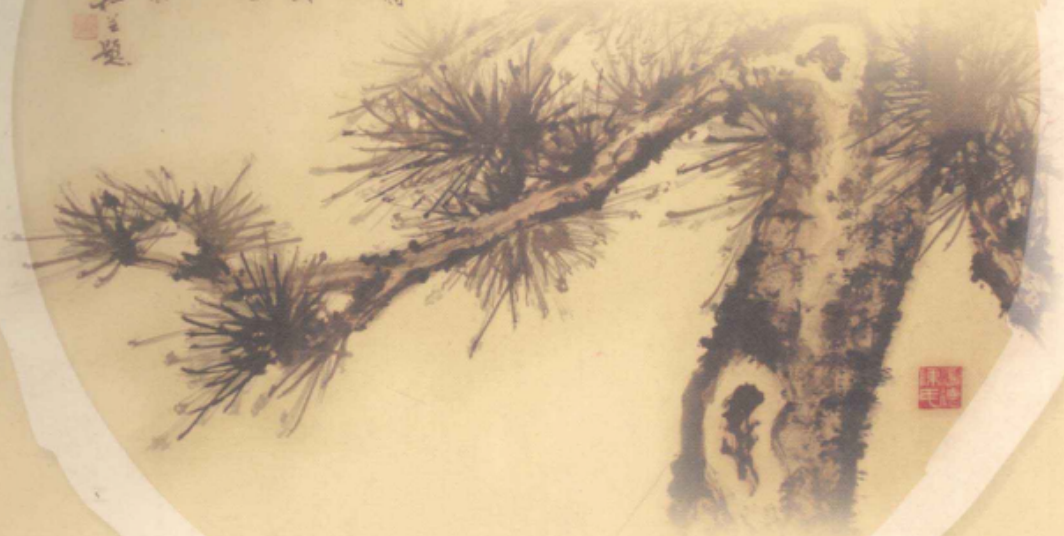


百年來中國現代高等教育

國家・學術・市場之三角演變

持淨香
松高百
尺有成
畫是綠
探材
筆正而辰
陳子如畫



作者／王瑞琦



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 NCCU

百年來中國現代高等教育



國家·學術·市場之三角演變

ISBN 9789860091236



定價：新台幣300元（平裝）

百年來中國現代高等教育

國家・學術・市場之三角演變

作者／王瑞琦



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 NCCU

百年來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國家·學術·市場之三角演變

- 作 者 王瑞琦
出 版 者 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發 行 人 林碧炤
發 行 所 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電話：(02)2939-3091#62811 傳真：(02)2938-7526
- 版 刷 2007 年 3 月初版一刷
定 價 新台幣 300 元
排 版 英杰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 293-3 號 10 樓之 1
 電話：(02)2732-1234 傳真：(02)2732-9531
-

序 言

康德（Imm. Kant）在《學院之爭》（Der Streit der Fakultäten）中曾指出，任何人為制度均非隨意的雜湊堆積，而是植基於理性原則的規劃。大學中學院組織結構與學術等級之劃分亦悉依理性原則。大學中學術分化及其與政、經、社會系統之間的互動關係，R. Stichweh 借助於 N. Luhmann 的系統理論，以內在分化（Innendifferenzierung）和外在分化（ausendifferenzierung）來說明學術內在趨向複雜化，而使某一門學科更邁向成熟，導向某一種程度的自主，而與外在環境系統有所區隔。新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比較教育學者 J. W. Meyer、F. O. Ramirez 等咸認為全世界教育制度有趨於一致化的基本傾向。以歐洲近年來高等教育的改革而言，1999年29個歐洲國家共同簽署「波隆納宣言」（Bologna Declaration），提出建立「歐洲高等教育區」（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的構想，而其採行的策略措施，如建立學士/碩士學位制度，採行可累積、可轉銜的學分制度等均取資美國制度。這種趨同性的高等教育發展，表面上是為促進國際合作，骨子裡卻是充滿了國與國之間的競爭，為講究競爭，高等教育之市場化，殆所難免。國家在學術自主與市場化的張力中宜扮演何種角色，庶免於大學乖離教育理想，是為近年來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發展共同關係的課題。1986年H.-G. Gadamer在海德堡（Heidelberg）大學創校六百週年的紀念講演即已對國家與企業介入高等教育可能造成的偏枯發展提出警訊。而事實上，學術自主、國家管理與市場機制三者動力關係的分析，也常為近年來高等教育研究者所援用的方法論架構。

王瑞琦教授這本大作，即採取國家、市場與學術三者的動力關係作為分析架構，探討百餘年來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全書結構，除第一章，文獻分析與方法論架構之建構而外，其餘各章可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份主要探討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期，中國新舊高等教育制度交替中，國家、學術、市場三個體系之建構及其之間的角力關係。有鑑於現代中國高等教育主要移植歐美體制，因此第二章先就歐、美高等教育體制的建立過程與特質進行分析。由之，可以發現民初的學界急於拋棄傳統制度的學界，卻未能擺脫舊時代政、教之間的糾結，以及排它的傳統特質，因此雖有理念，卻僅見對立未見共識，致令高等教育發展失焦與失序，成為國民黨執政之後控制教育的藉口。高等教育城市化、菁英化惡化亦隨著國家的分裂催化，形成了菁英與大

眾路線的對立與衝突。

第二部分，從第六章至第八章，分析 1949 年至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期間，國家霸權之再現。這段期間，藉由鎖國和民粹的結合，國家機器的控制力量發揮到極致，民國時期所形成的學術力量與教育市場因素快速萎縮，幾至窒息。然而這兩股力量就在國家機器展現高度效率的過程中，亦積累了強大的反撲能量，最終形成菁英與大眾兩條路線的激烈衝突與對決。

第三部分是 1980 年代迄今。第九章先讓讀者瞭解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市場因素的崛起和茁壯。二十世紀末在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的催化之下，國家與市場的結合帶動了高等教育的轉型，也成為國家與學術體系之間關係的變數。接續的兩章分述大陸高等教育如何在改革之中重回到世界潮流，並從平均主義轉向非均衡發展的路線，至 1990 年代中期之後有所謂跨越式發展政策的推出。在此調整之中，學術、市場因素再起，卻也同時看到菁英主義的制度化。高等教育的階層化特質帶動了教育學者對教育發展失衡進行反思。

綜覽全書可以發現本書結構謹嚴，資料豐富。尤為難得者為本書已突破過去多數高等教育研究囿限於法令規章、制度沿革分析之格局，提出一個新制度主義方法論下的國家、學術與市場互動關係之分析架構，深入探討百年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之深層意識型態與結構變遷，可以說是發前人所未發，在中國高等教育研究上樹立了極具獨創性的里程碑。本人有幸先睹為快，激賞之餘，故樂之為序，以廣向學術界推薦。

楊深坑謹識

2007 年 3 月 9 日

自序

1985年我從美國回台灣，進入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從事翻譯工作，同時在東吳大學兼課。我有個嗜好，找書、看書。閒暇之時，就在當時全國僅有的中國大陸資料室，翻閱來自彼岸的教育期刊和報紙，半年之後寫了一篇中國大陸小學語文教育的文章，一年之後，辭掉兼課的工作，專心於翻譯和研究，研究主題從中小學教育轉至高等教育發展領域，1994年完成第一本著作，有關中國大陸大學招生制度。1996年之後，全心於研究，發現兩岸高等教育的制度雖然不同，卻有許多相近之處。

1996年，我第一次到中國大陸，來到名聞已久的杭州，當時道路還在修整，公車破舊擁擠，望著浙江大學破舊的大門和門前的警衛，不免有些挫折和失望。2005年再度來到浙江大學，從機場坐大巴到杭州，看不見舊時的道路，也找不到破舊的房子，浙大已成爲一個多校區的巨型大學，走過一棟棟新大樓，和陪同的學生在乾淨的大食堂用餐，印象深刻。第二天參訪1990年代末高等教育擴張的指標，浙江城市大學，一面隨著陪同的老師逛美麗的校園和新穎的圖書館，一面聽取該校對於朝向國際化的期待。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與制度的蛻變，改變了世人對它的印象，也成爲我持續研究和拓展視野的主要動力。

這本書從開始動筆至今4年。最初只是想分析1980年之後迄今20多年期間，高等教育菁英與大眾化發展兩者之間的問題。未幾，就發現這個問題根植於1950年代的蘇聯體制，因此改爲半世紀。再深入研究，又發現菁英與大眾化之間的矛盾實可回溯至民國時期，以至清末，最後竟變成二十世紀百年的發展。本書撰寫的時間也就一拖再拖，其間因遇到瓶頸，中斷半年，尚幸獲得兩次國科會計畫的支援，又連續兩年負責兩岸高等教育學術會議的協調工作，得以向兩岸的教育學者請益。

這本書的完成要感謝許多師長、朋友的鼓勵和支持。在教育領域，戴曉霞、楊瑩兩位教授的鼓勵，以及馬信行、彭森明、林明地、詹志禹教授的關注。在社會學科，國關中心同仁盧倩儀教授、已分別轉任政治系、東亞所的寇健文、耿曙教授曾在研究方法上所提供的協助，爲我今日的研究奠定基礎。同仁宋國誠、江振昌、趙甦成教授和東吳大學何萍教授爲我的書面和題目提供寶貴的意見，以及其他國關中心同仁的關懷，讓人備感溫馨。很幸運的是，

過去兩年，獲得政大林碧炤副校長的耐心指點，得以從兩岸交流事務中成長。中正大學楊深坑副校長，不但在百忙中數度撥冗予以指導，幫助我突破先前的思維和架構，將歷史和比較教育兩個研究途徑結合在一起，更願為拙著作序。

其次要感謝彼岸的朋友和學者們。雖然大多數只是短暫的訪談，有時甚至不知彼此的名字，但是因為他（她）們的友誼、指點，才有這本書的完成。由於兩岸制度不同，常帶給彼岸學者困擾而不自知，也總是讓我事後深感抱歉，但是這些互動讓我更瞭解和尊重彼岸的制度，幫助我在撰寫這本書的過程中不時調整自己的角色。盼望此書不致讓他們太過失望。

另外要感謝的是過去一年持續為我禱告，陪我走過最艱辛時刻的教會弟兄姐妹。每週五晚上，從他（她）們那兒，支取精神食糧，第二週再努力奮戰。也要感謝好友葉稚英幫忙校對，王玲玲耐心幫忙本書的第一校和書內文句的潤飾，以及學生助理李華彥、鍾詠翔、江俊宅、呂淑禎在總校中的幫忙。更要感謝外子和公婆的諒解與寬容，讓我得以安心撰寫論文。

最後，要誠摯感謝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全額補助出版、中心助理楊芷菱小姐協助各項事務，以及負責排版的英杰的李皓蘭小姐對於我一次又一次的修正的容忍。本書的封面是以先慈所遺留的國畫大師陳子和的一幅畫為底，正如畫中的題字「待得喬松高百尺育成盡是棟樑材」所提醒，人才是經長期耐心培育而成，教育制度亦是如此。

王瑞琦

2007年3月9日

目 錄

序	iii
自序	v
導 論	1
第一章 研究方法	11
第一節 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主要途徑	11
第二節 國家、學術、市場三角架構的建立與特質	18
第三節 中國現代高等教育三角動態關係演變之探討	23
第二章 歐美高等教育體制的建立與三角關係互動的形成	33
第一節 歐洲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國家角色的興起	33
第二節 柏林大學的建立與學術力量的崛起	37
第三節 美國研究型大學的崛起：學術因素與市場因素的結合	41
第三章 二十世紀初中國傳統與現代高等教育制度的交替	53
第一節 科舉教育制度發展的特質	53
第二節 新教育制度的建立：市場因素的浮現	61
第四章 民國前期的自由放任與擴張(1911~1927)	71
第一節 民國前期高等教育的擴張、成長與失序	71
第二節 民國前期高等教育發展失序之分析	78
第五章 民國後期的國家控制：菁英與群眾路線的對峙(1928~1949)	91
第一節 國民黨政府時期的國家干預與菁英特質	91
第二節 延安地區的群眾路線	104
第六章 國家霸權再現與高等教育體制改造(1949~1957)	119
第一節 黨化與國家霸權再現	119
第二節 延安教育經驗的落實與群眾路線的改造	121
第三節 蘇化與新菁英體制的建立	125
第七章 國家霸權的失敗：菁英與群眾路線的第一次對決(1958~1960)	137
第一節 菁英與群眾路線的第一次對決	137
第二節 大躍進運動與高等教育的第二次改造	148
第八章 菁英與大眾路線的第二次衝突與對決(1961~1976)	161
第一節 整頓時期菁英發展模式的重建	161
第二節 群眾與菁英路線的再次對決	167
第九章 二次大戰後世界高等教育的擴張與市場因素的崛起	177
第一節 高等教育的擴張與市場因素的生根 (二次大戰後至 1970 年代末)	177
第二節 市場因素的崛起與三角關係互動的變化 (1980~ 迄今)	188
第十章 文革結束後高等教育的去蘇化與市場因素的復甦(1977~1991)	209
第一節 蘇聯體制的重建與菁英路線的重返(1977~1982)	209

第二節	普通高等教育擴張與菁英大學群之浮現(1983~1989)	216
第三節	1980年代高等教育改革中的盲點	225
第十一章	新舊世紀之交中國高等教育跨越式發展	235
第一節	人力資源發展政策的演進與高等教育跨越式發展	235
第二節	高等教育的擴張、鬆綁、多樣化	242
第三節	高等教育的追求卓越與金字塔頂層的建構	252
第四節	高等教育體制轉型中的變與不變	264
結 論		289
參考書目		297
壹、中文		297
一、書籍		297
二、期刊論文		301
貳、英文部分		315
一、書籍		315
二、期刊、論文		318
參、學術網址		323
附 錄		325
附錄一	文革前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統計數據	325
	1. 專任教師統計人數(1949-1981)	325
	2. 文革前高中畢業生人數與大學招生人數之比例(1951~1965)	326
	3. 高等院校數與規模(1949~1981)	326
	4. 文革前大學招生人數與在校生成長比之變化	327
附錄二	文革結束後中國高等教育規模之變化	328
	1. 中國五年經濟計劃之內涵	328
	2. 1978~1992 招生人數與在校生成長比之變化	329
	3. 1978~1992 招生人數與在校生成長比例之變化	330
	4. 中國高等教育招生人數規模之變化(1992-2004)	330
	5. 1992~2004 招生與在校生成長比例之變化	331
附錄三	中國研究生教育規模之變化(1978-2004)	331
	1. 1978~1992 研究生招生與在校生成長比之變化	331
	2. 1992~2004 研究生招生與在校生成長比之變化	332
	3. 1989~2004 研究生招生與在校生成長比例之變化	332
附錄四	中國重點大學的設置	333
附錄五	「211工程」學校名單(2004/8/17)	336
附錄六	中國高等教育「985工程」一期重點共建	337
附錄七	中國高等學校學術與管理自主權的變化(1996~2001)	338
附錄八	自主招生試點之大專院校	339
附錄九	2002年中國大學的管轄權	340
附錄十	中國55所研究生院名單	341
附錄十一	中國高等教育一級學科整體水平評估指標體系	342
附錄十二	中國中央與地方高校主要經費來源變化	344
附錄十三	2002年中國部分省份公立學校和民辦高校收費標準	345

圖目次

圖 1-1	BURTON R. CLARK 的三角架構	19
圖 1-2	國家、學術、市場三角關係因素的互動模式	21
圖 1-3	國家、學術、市場三體系之內涵	26
圖 2	美國、德國高等教育發展中三角因素的位置	47
圖 3-1	科舉教育三要素關係圖	59
圖 3-2	科舉教育制度與德美教育制度之比較	60
圖 4	民初高等教育發展中大眾與菁英路線的衝突	76
圖 5	國民黨教育與延安教育之比較(1928~1949)	111
圖 6-1	1950 年代中國高等教育的新階層	131
圖 6-2	1950 年代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三要素	132
圖 7-1	百花齊放時期大學校園中的對立因素	144
圖 7-2	1957 年大躍進前夕高等教育權力之衝突	147
圖 7-3	文革前中國高等教育與人力資源配置之關係	154
圖 8	文革時期高等教育革命運動之運作	172
圖 11-1	中國人力資源發展政策與就業市場的演變(1996~2001)	240
圖 11-2	中國大學外籍學生人數之變化(1992~2003)	262
圖 11-3	2003 年中國大學外籍學生攻讀學位結構圖	262
圖 11-4	1990 年代中國公立大學的體制改革與轉型	265
圖 11-5	中國高等教育金字塔的結構	266

表 目 次

表 3-1	歐美與中國高等教育演進與發展之時間表	54
表 3-2	後科舉時期教育改革思潮	63
表 4-1	1911~1926 年之間中國主要的教育思潮	83
表 4-2	美國、德國、民國時期高等教育發展背景之比較	84
表 6-1	院系調整前後中國各大區高校數和學生數的變化	124
表 6-2	院系調整前後高校結構及其學生數的變化	128
表 7-1	1955-1957 年中國高等教育發展中重要事件	138
表 7-2	中國大專院校教師結構之變化(1949-1957)	142
表 8-1	1950 與 1964 年中國各地區的高校數之比	164
表 8-2	大躍進時期與整頓時期高等教育兩條腿走路政策之差異	165
表 9	部分國家高等教育機構數之成長與大學入學率(1950-1975)	179
表 10-1	鄧小平關於知識份子、人才的講話(1977-1980)	211
表 10-2	文革結束後高等教育的重新定位	212
表 10-3	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計算方式修正後之差異(1965-1985)	213
表 10-4	中國 10 所工科大學博士點統計數據(1981-1990)	222
表 10-5	1993 年中國 33 所研究生院發展情形	223
表 11-1	二十世紀末關於中國人力資源發展之決策與文獻(1996-2001)	239
表 11-2	中國高等教育規模之變化(1998~2004)	244
表 11-3	中國公立高校經費構成變化 1995~2000 年	247
表 11-4	1989-2000 年中國高等教育成本分擔情況	247
表 11-5	「211 工程」、「985 工程」定位之比較	255
表 11-6	2001 年部分省分、自治區地方普通高校辦學條件狀況	271

導論

二十世紀末，世界高等教育的發展面對了兩大衝擊。第一個是知識經濟的發展改變了知識生產的模式。知識的產生從校園延伸至社會中，不再由大學獨攬，也不再侷限於菁英階層，並藉教育大眾化、社會抗爭、社會運動，以及資訊科技，擴散至社會大眾¹，除了一流的研究、科技的應用、資訊的散播，也包括了各類知識和社會技術²。專業知識和業餘知識之間、不同學科之間、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理論和實際之間的界限愈來愈模糊³。日新月異的科技使得經濟發展從仰賴人力、強權或機械，轉向系統的知識；工業生產的重心從勞動密集產品，轉向知識密集產品，勞動力的內涵也從製造產品轉向提供具創造力與知識性的服務。

第二個衝擊是全球化。全球化的定義各家不同，但是全球化以經濟為主要動力，立基於資訊科技發展與財經資本主義是眾所認同的。資訊科技取代了國家文化、錢財或強權，作為當今社會聯繫的管道，以之超越國家的界限，削減場域空間的重要性，實現了古人天涯若比鄰的夢境，形塑出網絡社會，以致地球村的概念。這個地球村一方面強調相互依賴、相互觀察與合作，另一方面以城市為主，藉由國際金融資本主義相聯結，強調跨國市場、財經與通訊的發展⁴。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迫使國家轉向市場找尋答案，致力於市場的擴張、資本流動的增加，與專業化的走向，以吸引跨國企業⁵，而其主要途徑就是加速發展高等教育。

上世紀末，知識經濟初起之時，中國就以其龐大的消費市場和低廉的勞工吸引外資，成為世界經濟全球化中的新成員。至1990年代，又加速高等教育的擴張與體制改革，不但成為歐美等國家高級專業人才的供應站，更以之吸引跨國企業進駐，提升其在世界經濟全球化中的角色。而1950年代初所建的蘇聯體制，就像校園中老舊的校舍逐一被拆除，快速向美國模式發展。短短十年之間，傳統的公費教育轉變成學費教育，菁英大學朝向研究型大學轉型並走向國際化，其他一般院校亦透過院校整併與擴張，從單科大學轉變成綜合大學，同時又見到民辦大學的茁壯、大學城的發展，以及國際合作辦學的興旺。不論從市場擴張或是學術發展的角度，中國高等教育均是各國菁英大學爭取合作的對象。但是中國高等教育的起飛，對於近在咫尺的台灣高等教育，卻變成了一個複雜難解的習題。

對於中國高等教育的高速發展，台灣學界與社會感受最深的無疑的是教育市場競爭。依據彼岸教育部港澳台辦常務副主任丁雨秋所稱，台生赴大陸求學人數，1985年至2000年之間共2,895人，研究生864人；2001年至2004年之間招收本科生2,875人，博士碩士研究生2,766人；2004年台生人數多達1,777人⁶。2005年秋季，彼岸實施台生學費比照本地生之政策⁷，去除了長久以來台生遭受差別待遇的批評。同年10月4日，台灣就業情報雜誌社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台灣學生在留學國家的選擇上，中國已超過英國，躍居第二位，僅次於美國。在選答求取大陸學歷的考量因素時，受訪者不再聚焦於就業考量，也包括國際間學歷認同度高、彼岸大學的名氣，以及學校專業化程度⁸。台灣考生留學大陸的數字無疑的將隨著彼岸上海交通大學每年的競爭評比報告，彼岸菁英大學國際化的發展不斷成長。套用 Michael E. Porter 的五力分析架構，由於中國菁英大學的快速轉型與國際化，其對於台灣大專院校的威脅，已逐漸從「潛在進入者」的層次轉入成為「替代品」的層次，與西方國家共同競逐台灣的教育市場⁹。

在學術發展方面，彼岸對於菁英大學的巨額補助、菁英大學內部體制的改革、國際化發展的快速，以及雄厚的學術研究人力資源，均令台灣高等教育界備感壓力。如今，除了日漸頻繁的互訪與學術會議，對岸訓練出來的博士生已成為台灣自然科學博士後研究的主要來源之一；在特定的領域，台灣學界已得向對岸取經。新世紀，這些學術交流與合作勢將有增無減。

質言之，由於全球化的潮流，由於中國高等教育的蛻變，兩岸高等教育已進入了一個競合的時代。良性的競爭與成功的合作是立基於雙方對彼此發展本質的瞭解。兩岸同出一源，但是制度相異，多年來，在雙方的互動中，一方面有著熟悉與親切之感，另一方面卻也有著些許的陌生。這種既陌生又熟悉的感受，夾雜著早期意識形態教育的背景、學門的差異，以及兩岸關係變化等因素，使得台灣的社會與學界對於彼岸高等教育的評價南轅北轍，因此對於彼此之間競合關係的發展，也是意見分歧，正反兩方相互對立。積極者看到中國傳統知名大學的蛻變，兩岸高等教育交流中所存在的商機；悲觀者認定市場的開放會導致台灣大專院校的倒閉與高等教育產業的萎縮，對於「中國化」更是憂心忡忡。兩者之間找不到交集點，而其最直接的效應就是彼岸大學學歷採認的爭議與延宕。

新世紀，中國已成為經濟全球化中不可或缺的成員，僅從現今學界所談論的不再是中國的「和平演變」，而是「中國崛起」、「中國威脅」論，就

足見其在國際舞台中角色的轉變。對於這個日漸強大的巨大市場，不論願意與否，一水之隔的台灣都必需面對，防堵已不足以應付。就高等教育發展而言，彼岸學歷認證政策的延宕對於遏阻台灣青年學子負笈彼岸已失去其積極意義，兩岸高等教育的交流勢將快速發展。因此，不論從台灣教育消費者的需求，或是從校際之間的交流，或是學者個人之間的互動角度，台灣對於彼岸高等教育發展必需深入的探索與瞭解，必需跨越這熟悉又陌生的階段，方能為兩方的競合關係找出適當的定位，也方能在互動中保持本土之特質，擺脫「中國化」的憂慮。然而，中國大陸幅員廣大，兩岸高等教育發展差異又大，台灣要如何去瞭解？從何著手？從那一個角度去瞭解？

台灣對於現今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研究，可追溯至 1950 年代國民黨政府遷移至台灣之後，不過早期僅開放給情治單位與曾為國家智庫，現今已併入國立政治大學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配合國家政策之需求，研究者主要從政治發展的角度詮釋，高等教育本身的發展次之，而相關之論述刊載於現今中國大陸研究季刊的前身匪情月報，僅供政府決策機構參考，直到 1987 年解嚴後，中國之研究才得以鬆綁。1990 年代初，留學大陸熱潮漸起，政府學歷採認政策開始起動，有關中國高等教育的論述如雨後春筍，但是也因如此，偏重實務，分為兩大類：一個是接受政府部門資助，供國家政策參考的研究報告¹⁰；另一個是以台灣學子為目標，介紹大陸菁英大學，於 2002 年達到高潮，反映了當年留學大陸的熱潮¹¹。相對的，學術專業性之研究受到資料的限制與中國地區差異之侷限擴張有限，並以實務與現況發展為主，同時多聚焦於某一個面向，具高度的時效性¹²，對於深入瞭解其發展的本質助益不大。

在論及中國經濟改革之研究時，台灣學者朱雲漢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於局部性分析提出以下的評論：

「中國大陸這樣大的體制，有一套運行遊戲規則，如果不瞭解這規則，就好比在五里霧中研究，而沒有一羅盤引導你…由於中國在 1949 年或是 1979 年都出現天翻地覆的變化，而且每層面的變化都會相互牽引，所以不能假設其他的條件並不存在。是以作局部分析是不現實的，因為這個社會有著巨大的變化，包括共產黨內部的運作，以及如何與社會調整關係，都屬於根本性的變化」¹³。

過去十年，由於中國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其研究亦快速成長，同時在

本土與非本土研究者之間存在一個差異。對非本土的研究者而言，一個曾經與資本主義勢不兩立，仇視知識份子，強調平均主義的蘇聯教育體制，在短短的 20 年間，不但以商品化、市場化爲訴求，進行體制改革，致力於一個美式金字塔的建構，而且容忍大學校園內的學店行爲，的確可以說是一個天翻地覆的轉變。但是就中國本土學者而言，這個高等教育制度本質上並未改變，是計劃經濟體制的最後精神堡壘。本土與非本土學界兩者之間認知的差距顯示了現今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其實是在一個新舊制度交替的過程中，也就是本土學界常稱的「轉型時期」。換言之，在這個新舊制度交替中，必然有一些是舊的，不變的，另一些是新的。那麼，不變的是甚麼？變的又是甚麼？探索這些變與不變，將有助於我們深入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基本特質。

要追溯一個制度的變與不變，就必需回溯到過去，回到歷史的發展。對於現今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探討，一般均是以 1949 年爲起點，本書則認爲其應回溯到其形成之時，也就是 1905 年科舉制度廢除，現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甚至 19 世紀末，京師大學堂成立之時。而且這個歷史發展的探討，不應侷限於中國本土，應是與歐美高等教育發展之特質進行比較分析。此一歷史研究與比較教育之分析的結合主要有三個立基點。

一、從歷史研究論之

歐美高等教育發展之研究有兩個共同特質。第一是強調歷史的傳承，並著重於跨世紀之論述與比較¹⁴。例如，探討美國研究型大學者都會回溯到十九世紀初柏林大學的起源與英國博雅教育的影響，甚至回到中古世紀大學發展的特質¹⁵。即便是國際化，研究者都刻意強調起於 16 世紀¹⁶，甚至遠溯至歐洲中古時期，學生在各國大學之間的游走¹⁷。是以，傳統背景差異之比較成爲詮釋現今各國高等教育擴張與結構變化的主要變數之一¹⁸。第二個特質是強調高等教育漸進發展的特質。重視傳統的歐洲各國固然如此，以市場機制爲基礎發展的美國亦然。美國加州大學模式的主要建構者柯爾（Clark Kerr）在論述多元大學理念之前，先將時空拉回至希臘柏拉圖時期的特質¹⁹，隨後又以 *Higher Education Cannot Escape History* 爲後續著作之名稱，突顯高等教育制度傳承與漸進發展的特質²⁰。阿貝曲（Philip G. Altbach）亦指出，二十世紀後期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並非出於詳盡的規劃，而是逐漸演進而成²¹。

相較於歐美高等教育發展之研究，中國大陸高等教育之研究顯得極度的片段化與零碎化，先是以 1905 年科舉制度廢止爲界，分成傳統與現代兩個階

段，兩者各自發展，繼而以 1949 年為界，分民國時期與蘇化之後兩個階段，兩者仍是涇渭分明，各自論述。1949 年之後的發展又以 1977 年為界，分經濟改革以前與之後兩個階段。這種歷史的切割使得現今高等教育與中國傳統教育之間一直存在著一道鴻溝，兩者之間不相關聯。現今的中國的高等教育研究概從 1949 年開始，似乎所有的問題均從「蘇聯」制度移植之後才開始，並且聚焦於有形制度的變化。

然而，眾所周知，1950 年代之後的高等教育的仿蘇體制是一個制度的大改造，改造的對象不僅止於民國時期的教育理念與體制，更以肅清中國傳統教育思維與特質為最主要訴求。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證實了制度改造的困難，而其挫敗則是證實了傳統特質的強韌和持續。直至今日，舊教育制度的痕跡在當代中國高等教育發展中，仍清晰可見。這也是為何現今台海兩岸的高等教育制度雖然迥異，其發展與問題卻有許多相似之處。朱雲漢就強調，雖然今天中國面對的世界跟過去不一樣，但是對其瞭解不能只從 1979 或 1949 年做起點，而是應將她擺在一個兩百多年、或四百多年的歷史架構裡面去理解：

歷史是一個具有高度延續性的東西，近代中國如何面對挑戰與回應，她不同階段中有不同的策略。或者是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可以把她看成是現代國家建構的過程，1979 年不過也是這個長程中的一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很多難題，像是發展、正當性的問題等，都是可以相互參照的。這些都是當你要作一個歷史結構的分析所需要去參考的角度，可以引導你提出問題，或是分析的線索²²。

誠如著名史學家 Fernand Braudel 所言，現在與過去不僅不衝突，反而能夠照亮過去，反之亦然²³。但是，如朱雲漢所言，在現今的研究中，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和角度常被忽視。

二、從比較教育角度論之

阿貝曲指出，高等教育政策不同於科學，很難創造一個實驗過程，因此可藉用比較分析，檢視另類選擇²⁴。克拉克（Burton Clark）提醒，不同國家之間的比較可幫助研究者在探討單一國家時，避免受到個別國家之特質和自己一些想當然之假設所侷限，本土的思維和觀點對於高等教育研究尤其不